

对一组南京大屠杀史料的考订

刘燕军

内容提要 章开沅先生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中,收录的一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案例,非常特殊,其体例与《南京安全区档案》有关案例不同,其中的大多数记述都与农村和农民有关。本文结合拉贝等外籍人士的日记、报告以及江南水泥厂档案等相关的记述,并请章先生查对了英文原稿,认定这组案例出自江南水泥厂难民收容所负责人辛伯格(丹麦国籍)之手。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巴遂伯尔格(Basuiberg) 辛伯格
江南水泥厂

近年来,章开沅先生利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料,出版了一系列论著,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在1995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中,章先生从《贝德士文献》中收录了一组特别的案例,为《南京安全区档案》所未见。章先生也注意到这份案例非同寻常,特别做了说明,“原稿为英文打字,最后有整理者手书:‘这是我亲自处理的若干案件’(Basuiberg) 1938年2月3日。”其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编辑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一书,也收录了章先生翻译的这组案例。

巴遂伯尔格是一个难民营的组织管理者,他记录整理的这组

章开沅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9页。

案例按编号应有 34 例,实际只有 30 例,缺第 21、24、25、27 例。与《南京安全区档案》中收集的 400 余份案例相比,这组案例有几个明显不同的特点。

其一,在 30 例案例中有 9 例是关于中国士兵的,记录者对士兵所属部队的番号都一一做了记载,涉及的部队有八十八师、十八师、四十一师、八十七师、一六师、五十八师、南京模范师等,这些部队除个别有差错外,都属于南京保卫战中国守军战斗序列。有的案例记述得很详细,如案例 7:“12 月 23 日,一个年轻士兵负伤两处前来求医,一处伤很严重(颅骨破裂),他告诉我们下列故事。他原是八十七师一个连长的传令兵,12 月 13 日战事进行时,他发现自己单独呆在太平门附近的无人地区,突然遇到日军。他投降了,保管的文件被没收。一个士兵用佩剑刺他的头部和颈部数次,他失去知觉倒下。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并且还能走路。藏匿 10 天以后,乘黑夜来到这里。”有的极为简单,如案例 6:“12 月 19 日,原八十七师一个士兵负伤两处来此。”直到 1938 年初,仍有中国士兵前往难民营避难,案例 11 记述道:“(1938 年)1 月 3 日,中国士兵来了,两个原属八十七师,一个原属五十八师,两人受伤。他们告知经过。12 月 15 日他们被日军俘虏,他们和其他数百俘虏被排列在南京下关江边用机枪处决,这三人逃脱枪弹并且装死,晚间爬走并且发现一个堑壕并保存几枚手榴弹。元旦那天,三个日本兵走进他们的堑壕,发现自己已入陷阱。他们抛出手榴弹,炸死两个日本兵,然后逃跑,终于到达这里。”

南京沦陷后,许多不及撤退的中国士兵逃往南京国际安全区避难,外籍人士在日记和书信中均有记述。但他们的存在给日军提供了借口,日军以搜捕所谓的“便衣兵”为由,在区内大肆屠杀青壮

可能是教导总队。

年。《南京安全区档案》所保存的400余份案例,主要记录的是日军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对平民百姓的暴行。为避免日军当局的猜忌,这些案例中基本没有中国军人避难的记录,更不可能把他们炸死日军逃往安全区的情况报告给日本当局。

显然,巴遂伯尔格将自己亲自处理的一些案件真实地记录下来,其目的不是提交给日本方面,因此有的案例将难民从受伤进入难民营到死亡的过程全部记录下来,时间跨度也相对较长。

案例9:“12月16日,一个中国农民来了,问我们是否可以到5公里以外他的村庄。我们去了,发现一个青年农民的头几乎被砍掉,我们给以初步医药处理,并把他送到这里以便护理。他的家属告知经过。12月13日,他和他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难民营要求庇护。两天以后,他和其他一些人回村取粮,碰上几个日本士兵正在搜寻中国士兵。他们硬说这个青年农民是士兵,所以应该处死,他们本想用刀劈下他的脑袋,但他的外衣领子高而且厚,稍许承受了刀劈的力量,日本人丢下他,让他自行死去。这个青年农民于1938年元旦死亡。”

案例10:“(1938年)1月2日,一个46岁的中国妇女由其丈夫送来,他告知经过如下。他和妻子有两个儿子,一个16岁,一个11岁,家住在靠近杭宁公路的村庄。12月10日,丈夫和长子被日军抓走充当夫役,妻子和幼子留在家中。12月12日夜晩,四个日本兵来到她家,醉醺醺地找年轻女人,由于未能找到而大发雷霆,枪杀她的幼子,刺刀戳伤她的左腿靠近膝部,骨头被破坏,然后士兵放火烧她的房屋。她总算逃出火焰,露宿数天无法移动,直至她的丈夫独自回来,大儿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丈夫无法帮助她,得不到任何医疗。大约在元旦那天,听说可以在我们这儿得到援助,她的丈夫就求得其他几个农民帮忙把她抬到这里。但此时伤口已

严重感染，我们爱莫能助，她于1月19日死亡。”

《南京安全区档案》中所记录的事件时间间隔很短。由于情况紧急，外籍人士及时将他们了解的日军暴行的一部分进行笔录，频繁地将这些案例提交给日本当局，敦促其改善日军的行为。

其二，在这组案例中，“农民”和“村庄”等字眼随处可见，至少有18条案例记述的对象是避难的农民。所有案例对受害者姓名和受害地点均没有明确的记载。

案例 22：“1月15日，来了一个农村孩子，由于耳聋，他写下经过。他说12日他在行经田野时被击中，一枚子弹穿过左臂，或许是公路上的日本兵曾喝止他。”

案例 33：“1月26日，送来一个64岁中国老农。他在（1937年）12月16日被日本兵击伤右腿，骨头完全折断。”

案例 34：“1月27日，一个年轻的中国农民被送来，他一直住在我们的难民营，昨天他回村取粮，不知何故受到日军攻击，用刀砍他，头、臂、手和身体左侧受重伤。”

南京国际安全区收容救助的主要对象是南京城内的市民，《南京安全区档案》中的400余个案例没有对农民的特别记载，虽然有不少城郊的农民也进入了安全区。这些案例一般均由各难民营主要负责人提供，由史迈士、贝德士等外籍人士核实后，整理记录成正式文件，重新打印上报给日本军方或日本大使馆，对事件发生的地点和受害者的姓氏一般均有明确的记载。

巴遂伯尔格所在的难民营具有一定的医疗条件，但条件很有限。案例 18 记述了他将一个伤势严重的孩子送往南京鼓楼医院治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章先生对部分条目重新做了修订，案例 10 中“靠近南京公路汉桥的村庄”被修订为“靠近杭宁公路的村庄”。

疗的经过：“（1938年）1月14日，一个五六岁小孩被送来，他的父亲说明原委。日本兵到他们村里抢掠食物，由于抓不到鸡，便用手榴弹炸鸡，一枚手榴弹在这个儿童附近爆炸，使他全身严重炸伤，炸掉一只眼睛，等等。由于伤势严重，感染恶化，我决定用摩托车把他带到南京中山门。我们被禁止进城，我恳求卫兵替我把孩子送进医院，仍遭拒绝，只有遵命离开。但我仍不死心，绕城行至太平门，快速行经岗哨，未受阻拦，终于来到美国大学医院，威尔逊医生为孩子治疗。”

这一案例非常重要。首先，我们可以从中认定巴遂伯尔格的身份，日军在占领初期，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只有外籍人士能够进出城门，尽管他们也经常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其次，巴遂伯尔格驱车将伤势严重的孩子绕道太平门送往鼓楼医院医治，说明难民营的地理位置绝不在南京城内，而应处于中山门外的某个地区。难民营处于中山门外的农村，前面案例中很多“农民”、“村庄”的记述也就迎刃而解，不足为怪了。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国际安全区外曾经有一些自发组织的难民营，如双塘（现南京第19中）、下关和记洋行、栖霞寺、江北的葛塘等，但这些都是中国人发起组织的，唯一的例外，就是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其组织管理者是德国人昆特和丹麦人辛伯格。

江南水泥厂是河北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子公司。1935年5月，在天津成立筹备处，颜惠庆为董事长，袁世凯的六儿子袁克桓（心武）为主任常务理事，向丹麦史密斯公司、德商禅臣洋行、英商怡和洋行购买旋窑、电器设备和开山机械。1937年，厂房竣工，设备安装完毕，于11月4日试机。但日军很快逼近南京，工厂被迫停止试机，并将部分设备拆除隐蔽。当时，移交手续尚未办理，贷款也未付清，产权仍属外商所有，昆特和辛伯格留在江南水泥厂，各自代表着他们本公司的利益。昆德出生于中国，曾任启新洋灰公司工

程师,后又向启新承租瓷厂自主经营,南京沦陷前夕,他以德商禅臣洋行的名义,任江南水泥厂经理。

江南水泥厂与前述案例所记述的几个特点基本吻合。它位于栖霞山东麓的摄山渡,南京市东北部,建厂之初曾以“模范农场”名义,征购 2400 余亩土地,其周围是广大的农村。民国以前,摄山到南京有驿路通达,二、三十年代,南京近郊修建了公路,宁镇公路摄山至太平门段大约 30 多公里。

在南京保卫战中,江南水泥厂所在的栖霞山地区,是南京的外围阵地,不少败退的中国军人到水泥厂避难,该厂历史档案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冬,各地逃难人民麇集于栖霞山暴众,闻其中不乏不及撤退之少数高级军官,以(已)失却政府保护,咸惴惴不可终日。幸赖昆德博士设难民区于江南水泥厂,收容男女难民约四五万人。”前述案例 3 曾记述原四十一师伤兵前往难民营求助:“12 月 16 日,一个原四十一师中国士兵前来求助,他在 10 天前肩部负伤,一直未得医疗。”而四十一师就曾在栖霞山和尧化门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后该师渡江北撤,这个士兵可能因负伤未能跟上部队。

难民营的医疗条件也很有限,早在 1937 年 12 月 20 日,辛伯格就打算将伤员送往南京治疗,因为他从收音机里听说南京的局势已经完全稳定,但实际情况与他听到的恰恰相反,在半路上他又让人将伤员重新运回栖霞山,因为日本人不让伤员通行。他步行了约 20 里路,后来搭上一辆日本卡车,才到达南京。在鼓楼医院提供的药物、绷带等物品的帮助下,昆德和辛伯格在水泥厂内设立了

《拉贝日记》,1937 年 12 月 20 日,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8 页;《史迈士致家人函》,1937 年 12 月 20 日,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3 页。

小医院和急诊室,但一直缺乏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1938年2月中旬,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前往访问时,医院里仍然只有“一个护校毕业的护士,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包扎员”,而且都“缺乏训练”。由于没有内科医生,难民营正筹划开设中医治疗服务。

南京国际安全区内设立了几个粥厂,曾有数万贫困难民依靠粥厂度日活命,不仅如此,国际委员会还设法运进粮食提供给难民。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显然在事先缺乏这方面的计划和准备,昆特和辛伯格两个人的力量又非常有限,因此这里的难民一直自行解决粮食问题,马吉在他的《栖霞山之行的报告》中写道:“少数富裕家庭,拥有可以支持四个多月的粮食,但绝大多数只有一个多月的口粮。”前述案例 9、12、21、28、34 等,多次记载了难民因为回村取粮食而遭到日本兵的袭击。

江南水泥厂厂史关于辛伯格的记载语焉不详,该厂《厂志·外籍人士简介》中的介绍,只有寥寥二十几个字:“丹麦人,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前夕来厂,不久离厂。”但辛伯格多次往来于江南水泥厂与南京之间,外籍人士的日记和书信中有不少关于他的记录。在南京沦陷之初,南京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因供电停止,收音机也无法收听,而江南水泥厂有自己的发电设施,辛伯格便把他收听到的有关消息带到南京。他还将栖霞山难民的求援信带到南京。12月23日,辛伯格驾驶着从拉贝的助手韩湘琳处借来的汽车再次来到南京,给南京的外籍人士带来了两头猪、三袋红薯。

马吉:《栖霞山之行的报告》,《天理难容》,第219-220页。

马吉:《栖霞山之行的报告》,《天理难容》,第218-219页。

拉贝、马吉、史迈士等人的日记和信函中都有记述,《拉贝日记》,第228页;《天理难容》,第201、293页。

《史迈士致家人函》,1937年12月22日,《天理难容》,第299页。

同时,他还带来了栖霞山难民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拉贝12月23日致信日本大使馆的田中,转交了请愿书。拉贝在信中说:“请允许我向您递交两份从栖霞山转给我,并请我转交的请愿书,栖霞山目前也出现了和我们在南京一样的困难局面。”

江南水泥厂位于长江边,为了沟通与外界的联系,他与史迈士和贝德士讨论——由他带信给经过栖霞山的英国船“蜜蜂”号,因此举过于危险,遭到贝德士的反对。他还用照相机拍摄了城外堆满壕沟的军民尸体。威尔逊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辛伯格今天回到城里,带来了更可怕的消息。他说,中国人为阻止日本坦克而挖掘的大壕沟里填满了尸体,还有一些是伤兵,尸体不够多,日本兵为了使坦克能通过,居然屠杀了附近的无辜平民,用他们的尸体来填平壕沟。辛伯格借了架照相机,拍了一些照片以证实所言非虚。”

1938年2月3日,辛伯格又将翻译成英文和德文的请愿书,带到南京,交给拉贝等外籍人士,《南京安全区档案》和《拉贝日记》中都有记载。他在附言中写道:“下面的信件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德文)的,因此多少与原文有些出入。信件来自离我住所5里路的栖霞寺,是该寺庙的方丈起草的,有当地20位知名人士的签名。”需要指出的是《贝德士文献》中收录的这组特殊案例的签署日期也是1938年2月3日。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辛伯格是唯一的频繁地往来于南京城内外的外国人,他应该就是本文考订的案例的记录者巴遂伯格

《拉贝日记》,第268-269页。

《史迈士致家人函》,12月26日,《天理难容》,第304页。

《威尔逊日记》,1937年12月25日,《天理难容》,第449页。据《中国青年报》2000年5月15日报道,江南水泥厂原工会主席王振庭曾经在厂内看过这类照片。

(Basuiberger)。为此,笔者向章开沅先生求助,章先生是学术大家,同时也是蔼然仁者,亲自为我查阅了他复印的英文原稿,很快给我写来回信:“贝德士保存的文献很多是原稿(包括史迈士的报告原稿),从史料的原始性来说,价值极高。但也正因为是手稿,当时纸张质量极差,有些甚至是油光纸,时间一久,难免磨损破碎,复印出来更为模糊难辩。”保存在《贝德士文献》中的这组案例是一份拷贝贝文件,签名又是手写体,字迹已经模糊,辨认起来十分困难。

章先生还指出:“当时情况紧急,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极为忙碌,文件中笔误缺漏之处也常常出现。”辛伯格的英文名字有几种不同写法,威尔逊的家信(1937年12月25日)中写成 Simburg,马吉在给家人的信中(1938年1月4日)又写成了 Sinderberg,在徐淑希编辑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中是B. A. Sindberg(1938年2月3日),马吉在《栖霞山之行的报告》(1938年2月16日至17日)中又写成 Simberg。江南水泥厂厂史写成“辛波”,与 Simberg 的读音很接近。如果去除 Basuiberger 中的前两个字母Ba,那么剩下的 suiberger,与 Simberg 就非常接近了,而B. A. 恰恰是他名字的英文缩写。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至今仍然对当年的南京水泥厂难民营缺乏完整清晰的认识。今年4月29日至5月12日,由江苏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单位主办的《珍爱和平与生命——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国际大救援》展览,在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市展出。随行的著名学者高兴祖先生专门撰写文章,请丹麦方面寻找辛伯格及其后人。奥胡斯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三人小组,负责此事。我们热切期待着他们能有新的发现。

(作者刘燕军,1967年生,现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

(责任编辑:刘兵)